

让历史记忆照亮时代征程

——抗美援朝纪念馆基本陈列部分新增文物

齐红

在历史的长河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座巍峨耸立的精神丰碑,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坚韧。抗美援朝文物,就是其无声的见证者。文物的展出,绝非简单的历史陈列,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当观众直面抗美援朝见证物时,历史便从书页中“走”了出来。这些实物将“保家卫国”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个体故事,让年轻一代真切理解,如今的和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烽火里的家国之牵挂

抗美援朝纪念馆藏有一封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写给胡长哲的回信。

胡长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32师96团军械修理所所长,1953年3月5日随部队赴朝参战。在国内,胡长哲就认真学习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入朝后,他和战友在坑道里,又重新学习。

1953年11月,胡长哲在坑道里给黄继光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亲爱的黄妈妈,英雄黄继光牺牲了,我愿意做您的儿子,孝顺您,我愿意将第一张立功喜报给您老人家寄去。

1954年1月,胡长哲在坑道里收到了黄妈妈的回信。

原文如下:“亲爱的长哲孩子,你十一月五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你对我的关怀,我近来身体很好,你别挂念吧!孩子!你的信是写得多么亲切啊!你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为人民立功的信心是多么坚定啊!这使我多感动的呀!我怎么不愿意你给我做孩子呢?你给我做孩子我是愿意的,并且是很高兴的,现在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孩子——胡长哲吧!你高兴吗?希望你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培养下,争取为人民立功,以使我早日看见第二张喜报,祝你努力前进!你的妈妈邓芳芝。五四年一月二日。”

在朝鲜战场上,这封信就是胡长哲的精神寄托,他始终将其视为珍宝。如今,收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这封“家书”背面就是胡长哲的第一张立功喜报。

生死同壕

展柜中,有一张染血的纸币,一个泛黄的日记本,这是志愿军第42军直属汽车连二排排长刘俊清烈士遗留的朝鲜纸币、志愿军第42军直属汽车连指导员费晓成的日记本。

费晓成与战友及老乡刘俊清于吉林通化集训时相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费晓成担任连指导员,刘俊清担任排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运送物资到前线,属于后备力量。二人是出了名的“黄金搭档”,感情深厚。

1951年7月的一天,他们遇到敌人的猛烈轰炸,刘俊清不幸牺牲。那张带血的朝鲜纸币,是他最后时刻对战友的嘱托和对亲人的思念。当天,费晓成写了一篇日记:“亲爱的战友刘俊清同志,光荣地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这一百元朝鲜钱是刘俊清同志血染红的,血迹作为永远的念别!……刘俊清同志,你安息吧,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我来代替你吧。”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费晓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刘俊清的家人。2022年,费晓成的后人终于在吉林省通化市找到了刘俊清烈士家人。

这两样展品不仅是历史的证物,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时刻提醒我们,那些用热血染红的信仰,永远值得被铭记。

硝烟中的星辰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运动厅展柜里,陈列着一个小小物件——用美军飞机残骸制作的勺子,小小的勺子里藏着战火中最柔软的牵挂,也映照着战士们对未来的炽热期盼。

郭方信,四川简阳人,1948年生。1952年夏天,志愿军借用了郭方信家里一个空的店面,做驻军的发电机房。由此发电机房的履行与年幼的郭方信成了“忘年交”。

几个月后,顾行随志愿军部队去朝鲜战场打仗。郭方信一直很想念他,直到1954年,顾行从朝鲜寄回一封信,里面包着一个很新的勺子,正面勺把上刻有和平鸽图案及文字“和平万岁”,背面勺把上刻有文字:赠给保罗小朋友 顾行 一九五四年。信里介绍了勺子是用被志愿军空军击落的美国飞机上的材料制作的,是不锈钢的,他希望郭方信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70多年来,郭方信一直想要再找到顾行,当面跟他说这个勺子保存得很好,自己很想念他。

这件烽火里的纪念物,是英雄留给后世的箴言:和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带着这份温柔的勇气,继续守护。

青春无悔 救死扶伤

一张立功证,让人们看到一位陆军医院药剂师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克服重重困难,为前方战友提供医用物资保障的决心和坚守。

1950年10月,郭仲文任东北军区第6陆军医院药剂师,随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天夜晚,医疗队在经过朝鲜白马山时,满载药物的马车翻倒,车上的蒸馏水全部打碎。如果没有蒸馏水,麻醉药就无法制成。紧要关头,他急中生智,将大学里学过的“净水处理技术”加以改进,用常用水加活性炭煮沸后过滤净化,反复多次后,终于配制成合格的麻醉药,及时解决了战地急需。为此,东北军区政治部授予郭仲文三等功。

1951年春,郭仲文所在医院因战时需要转移回国。回国后,他的主要任务是接收、治疗、转送朝鲜战场转运回国的重伤员。郭仲文夜以继日地制造手术用麻醉药、输血用抗凝剂、消毒剂等,同时还负责领取药材、采购部分药品等工作。他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

1951年秋,朝鲜战场缴获大量敌军军用物资,其中包括很多军用药品,但是药品无标签注明,无法使用。郭仲文通过显微镜检查其晶型后确认了一批急需药品,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同时也节约了药品开支,为此荣立一小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郭仲文虽未直接冲锋陷阵,却始终用专业技能守护着战友的生命。这份立功证让人们认识到,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是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纸婚书映山河

一纸婚书,见证了一段烽火岁月中的宝贵情谊。

这份结婚申请书记录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王凯与第114师政治部收发员段奇瓚的郑重请求,开篇直白:“我们业已互相了解熟悉,双方同意即行结婚请予批准”寥寥数语,勾勒出两位年轻军人的轮廓。

申请书的核心部分,是二人工整的签名及加盖的红色私印,申请书的末尾,是审核机关的意见和批示。在那个年代,军人结婚需经组织审查,不仅要符合纪律,更要考量是否影响战斗任务。结婚申请是对组织的承诺,也是对彼此的约定。

1951年3月,段奇瓚跟随志愿军第38军入朝作战,之后因伤回国治疗。伤愈后,领导得知她尚未成婚,便开始牵线搭桥。对方是志愿军第38军政治部保卫科的科长王凯,比段奇瓚年长10岁,正在朝鲜参战。两人开始通过书信联系,1952年4月,段奇瓚任志愿军第114师政治部收发员,再次赴朝,并于28日,与王凯在部队集体的见证下完成了简单的婚礼。

这份烽火中的誓约告诉我们:英雄,在国与家之间,选择了并肩担当;爱情,莫过于在生与死之际,愿意彼此照亮。

仁心暖邻邦 锦旗载深情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以高度的热情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志愿军所到之处,医务人员常为当地的朝鲜军民免费治疗各种疾病。有的部队还专门组织医疗队、医疗组到驻地给附近的居民治病,张兆惠就是志愿军医务工作者之一。

张兆惠15岁参加革命,1952年随志愿军工兵第6团入朝,救治志愿军伤病员无数。1953年朝鲜停战后,他调入工兵司令部门诊所任所长,继续为志愿军官兵疗伤治病,并为朝鲜百姓诊疗救助,直至1958年回国。

当时,由于张兆惠表现突出,荣立三次三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军功章等,多次受到单位嘉奖。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的实际行动,特别是在最艰苦和危险的情况下所给予的帮助,对朝鲜民众的影响十分深刻。在张兆惠回国时,安州郡龙潭里龙林村四组村民赠给他一面“巩固朝中友谊”锦旗,这是朝鲜人民对中国赴朝鲜医务工作者付出的认可与感激的直接物证,直观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抗美援朝文物不语,却字字千钧。让这些“活着的历史”走出库房、走进公众视野,就是让民族记忆代代相传,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抗美援朝纪念馆)

近日,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2025学术会议在河南洛阳举办。来自全国120余位文博机构和相关领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考古遗产的阐释传播”与“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创新与实践”两大主题展开深入且富有启发性的汇报与讨论。会议紧凑而丰富,涵盖《徐旭生年谱》新书发布仪式、主旨报告、分论坛发言及实地调研等环节,为考古遗产和遗址博物馆行业提供了交流学习和展示成果的平台。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展示考古遗产最为直接的窗口,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首次联袂举办。“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更是双方深化协作的崭新起点。”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主任李岗期望通过此类活动,进一步构建起两大领域专家学者的沟通桥梁,凝聚行业智慧、汇集发展力量,共同推动我国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开创事业新格局。

如何运用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一平台对考古遗产进行进一步价值阐释与利用,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主任孙英民认为,当前部分考古遗产的深入挖掘与公共性转化仍有不足,相关工作多集中于学术领域,考古文博行业应始终坚持且践行“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指导思想。如何让这些考古的专业内容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的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服务路径、创新转化机制。

与会嘉宾围绕“考古遗产的阐释传播”和“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创新与实践”两大主题作主旨报告。《中国博物馆》主编刘曙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柴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从不同方面总结实践经验与思考,探讨阐释传播策略,分享展陈创新实践,结合最新案例为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和考古遗产的展示与利用提供新思路。其中,赵海涛以《近年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为题,介绍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课题组开展的项目情况,该项目涉及古城寨、瓦店、二里头等遗址。围绕聚落变迁与社会变革开展“考古遗存生命史”的年代学研究,取得了对中原地区夏代前后整体社会情况的新认识。总结夏文化的特征:择天下之中建都,以多种礼器组合为核心标识的制度化礼制体系;铸铜技术突破与青铜礼乐制度的形成;广域国家王权的层级治理体系;多元文化融合的“天下政治观”。并以此确立夏文化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地位,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基础,成为后世礼乐文化的根与魂。他认为,在夏文化研究中需要科技手段、考古方法与历史文献并举,这样更有助于考古成果进行科学、可信的历史阐释。

在分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分别以“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创新与实践”“考古遗产的阐释传播”“《徐旭生年谱》出版暨徐旭生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为主题进行多角度研讨。

观点摘编

科技让“平民化”考古成为可能

杨雪、班晓悦在202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科技考古重现古代社会风貌》提出,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让考古学的视野悄然发生转向——从精英、宫殿与宏大叙事,逐渐回到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普通人。雷伦认为,以往“印第安纳·琼斯式”的探险考古往往聚焦于壮观的神庙、富丽的墓葬或稀有器物,而忽略了平民的日常生活。然而,恰恰是这些在田地和作坊中劳作的人,构成了古代社会的真实底色。随着生物考古技术的进步,通过对骨骼与牙齿的分析,结合同位素信号或几何形态测量,研究者能够追踪更大规模人群的亲缘结构与迁徙轨迹。环境考古则通过氮同位素、土壤中的磷含量,以及沉积物中的古DNA,帮助重建古人的生活条件与耕作方式。与此同时,材料科学的介入让作坊遗址焕发新生:从陶器制作、金属冶炼到玻璃生产,其工艺链与技术细节已远超仅依赖成品所能认识的范围。这种考察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视角,是当前考古学最重要的新前沿。

白陶的使用在二里头遗址从未被垄断

张飞、赵海涛在2025年11月第11期《考古与文物》撰文《二里头遗址白陶的生产与消费》认为:作为一种原料稀缺且具有远距离交换可能性的手工业产品,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的来源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对2020—2021年度Ⅸ区与ⅪⅡ区发掘出土白陶的岩相与制作技术分析,研究再次证明了南洼遗址是二里头遗址白陶的重要产地之一,并进一步提出了二里头遗址白陶产地多元以及本地生产的可能性。学界大多认为二里头遗址内白陶的使用与社会分化有着较强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等级差异的象征。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二里头遗址白陶消费模式的分析显示,宫城区贵族在白陶消费的数量、种类与酒器组合上均与其他区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显然与宫城区贵族在权力与财富上拥有绝对优势,能够获取更多相对稀少的资源有关。然而,白陶的使用在二里头遗址从未被垄断,遗址各区内的人群都可获得该类产品。这一点在墓葬当中体现得更为显著,平民墓葬也可随葬白陶。

记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2025学术会议

杨硕 李智博 王博楠 徐思洋

遗产阐释与展陈创新

在“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创新与实践”分论坛上,几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从遗址博物馆展陈的特殊性出发,与公众进行分享。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朱亚蓉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提升改造的实践与思考——以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探索为例》、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董平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使命与叙事——以〈昙石山文化陈列〉为例》、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胡小玉的《何以再生——考古遗址阐释系统的构建与价值激活实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叶晔的《物境·意境·情境: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的创新实践与思考》、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赵峰的《水下文化遗产的阐释传播——以南海1号为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周鼎凯的《当展览学会倾听:观众对话数据驱动下的遗址博物馆展陈演进》,分别围绕博物馆展览设计语言、策展理念、再生式遗址保护模式等做了交流发言。

“考古遗产的阐释传播”分论坛围绕考古遗址现场馆内外一体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视野、遗址博物馆的大众化阐释以及系统性展示等议题,介绍了考古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价值挖掘、传播方式的创新等课题。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规划设计研究所张治强的《中国考古遗产的展示方式和利用路径探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分院肖金亮的《浅议考古遗址现场馆内外一体化的遗产阐释与布展——以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博物馆的设计实践为例》、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吴红敬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视野下明楚王墓的价值与保护利用探讨》、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逯俊宁的《遗址博物馆的大众化阐释——以鸿山遗址博物馆为例》、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刘创的《考古遗址系统性展示方法探研》、苏州考古博物馆程义的《在博物馆领略江南名城文脉——苏州考古博物馆记》等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热切关注,并进行深入探讨。

在《徐旭生年谱》出版暨徐旭生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就《徐旭生年谱》的学术价值,徐旭生对夏文化研究的贡献及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新思路、新课题等问题进行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以《缅怀徐旭生先生 深化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为题,对徐旭生对古史传说时代研究的贡献进行了总结;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立东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分别以《徐旭生与中国考古学》和《徐旭生的学术贡献与夏文化考古的奠基》为题,就徐旭生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夏文化考古的贡献进行了梳理与回顾。

此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凝聚行业共识、指引未来实践的关键平台。会议针对考古遗产的现代表达与有效传播、遗址博物馆展陈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实现了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文博工作者将持续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克拉克瓷器曾受明代皇室关注

王冠宇在2025年第1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明代皇室与外销瓷器: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克拉克瓷盘新考》认为:以往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克拉克瓷器为专供外销而制,境内使用以江西部分地区用残次品随葬为主。然而,近年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表明,克拉克瓷器也曾受到明代皇室的关注与使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克拉克瓷盘,用以盛放冠冕,是益藩王族自成体系殓葬制度的一部分,其选用经过仔细斟酌。值得注意的是,该墓葬纪年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是江西地区可确定纪年的最早案例,其使用功能亦与民间用作“寿盘”的葬俗有本质差别。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在我国内陆遗址发现的明代克拉克瓷器并非普通的民窑产品。它们的贮藏与使用,常见于皇室宫廷、藩王府邸以及地方的高级行政机构。景德镇晚明窑业中,部分技术高超的窑户生产的优质外销瓷器,可能通过王府机构采购或作为赏赐礼物等渠道,进入宫廷及藩王族群视野并被主动选择。

东周时期古蜀未形成严格等级制度

周丽、江章华在2025年第5期《江汉考古》撰文《东周古蜀墓葬出土外来风格青铜器及其社会功能分析》认为: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有一套礼器性质的青铜器,作为彰显身份等级的显赫物品,并用于随葬。这类青铜器以楚式风格的青铜器为主,少量三晋两周地区风格的青铜器,越式青铜器相对不那么重要。蜀国上层统治阶层很可能与楚国上层统治阶层有较为密切的交往,通过贸易或赠予,从楚国输入一些青铜器礼器。但是楚国对蜀国还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输入品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必须仿铸;另一方面那些代表更高级贵族使用的礼器,并没有给予蜀国统治者。蜀国统治阶层虽然用这类外来青铜礼器彰显身份地位,维护现实秩序,但很明显,尚未如中原与楚国一样,形成一套整齐有序的制度。这似乎暗示蜀国虽然有社会分层,但并不像中原和楚国那样形成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既然没有完整有序的礼制,青铜礼器的生产与贸易,如果不掌控于最高统治者手中,必然有能力者就可以任意妄为。